

作家马伯庸携新书《大医》再回桂林

# 想写桂林的小说 只等一个灵感爆发

前不久收官的古装传奇短剧《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》看过吗？悬疑小说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、《古董局中局》，你没读过原著，总看过电视剧吧？这些作品的作者马伯庸来桂林了！3月5日下午，马伯庸读者见面会在桂林医学院举行。两点半时，马伯庸准时上台，跟以往的开场白不同，他首先跟大家汇报“见面前，我连吃了两顿桂林米粉”。

熟悉桂林米粉的老饕都知道，一顿可能是味道，两顿就一定是思念了。马伯庸也坦言，安排读者见面会时，他要求先安排广西，就是想回来“吃口米粉”。

见面会上，他就像一个归家的孩子，带着对桂林的思念，重温了在这里度过的青春岁月。

## 1 桂林的求学经历 搭起文学之路的框架

马伯庸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桂林米粉的小文章，文章虽然不长，但他用“矮脚桌椅”写出了米粉店的烟火气，用“烫熟、加卤水、筷子一搅”描绘了吃米粉的仪式感，他甚至还观察到了米粉店里似乎都有一个胖大嫂。文末，他遗憾离开桂林后不能再吃到正宗的桂林米粉。

其实细细读来，在这篇小文中，马伯庸不但写了对桂林米粉的热爱，还写出了他在桂林度过的青春时光。文章一开头就说“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在桂林呆过几年，当时住在安新洲”。马伯庸说，当时他家住安新洲，读书却是在临桂中学，也就是他今天开读者见面会的地方。也正是这段中学时光，为马伯庸日后的写作之路奠定了基础，筑好了第一层地基。

马伯庸记得，临桂中学的学风严谨，周围的同学和老师身上都有一种向上的拼搏精神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马伯庸。同时，学校非常注重对孩子们人文素养的培育。学校有一个图书馆，图书馆完全对孩子们开放，他时常去图书馆借书，从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到金庸的小说，再到各种世界名著，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书，他都会借回来不知疲倦地阅读。也就是这个时期的阅读，为他将来的阅读积累和底层文学见识奠定了基础。

马伯庸不常回桂林，但他却从没远离过桂林。他说，去年，由他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《两京十五日》在桂林艺术节亮相时，桂林的同学朋友纷纷发信息告诉他，“你人虽然没回桂林，但作品先回来了。”当时看到这些信息，他的感受就是“衣锦还乡”。衣锦自不需赘述，重点是“还乡”，马伯庸真正将桂林当成了一个家，他很高兴自己当年在桂林读书时汲取的文学养分，现在又通过作品回馈给了桂林，“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”。

## 2 想写桂林的小说 只等一个灵感爆发

读者见面会上，马伯庸说他这次回到桂林后，还特意去找了临桂中学门口的那家米粉店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找米粉店了，在桂林读书那几年，他探访过八里街的米粉店、尝试过瓦窑口的米粉店，还吃过当时的临桂县城用蛤蚧煮汤的米粉……马伯庸说，他熟悉桂林，喜欢逛桂林城，喜欢研究这里的山水和人文。

马伯庸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带火了西安，《风起洛阳》让大家聚焦了洛阳，而马伯庸将对桂林的喜爱藏在了每一处作品的细节中。他说，在他的作品中都能找到桂林的影子，尤其是在美食的描摹或者在对历史底蕴的探索两方面，都有他被桂林文化滋养过的印证。也许，桂林的读者可以在小说的吃面场景中咂摸到嗦粉的畅快，或者在主人公穿山踏水中感受到桂林的山水风韵；甚至在思考作品本身对历史的探索时，嗅到桂林深厚的人文气息。

马伯庸其实一直都在思考着为桂林写一本小说，而现在欠缺的只是电光石火的灵感。马伯庸写作的习惯是，如果要写一个故事，一定要先进行大范围详尽的调研。他在写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时，曾经把长安城市布局的每一坊都制成表格，然后参照典籍，边读边将诸坊的功能、典故、所居名人写进批注。而要是写桂林，马伯庸有一种成竹在胸的感受，倒不是他不需要再研究了，而是他在青春时就已经探索和丈量过这座城市，在成长后又不断与这座城市互联。他甚至研究过七星公园、穿山公园的典故，还对刘三姐文化进行了调研。

有了这么多积累，还承载着这么多感情，马伯庸说，现在唯一等待的就是一个灵感，“写作就是这样，首先要有大量的阅读和调研做基础，然后就等着一瞬间的缘分和灵感爆发。”而这次特意来到桂林举行读者见面会，也就是想多找一找桂林这部小说的灵感。



马伯庸读者见面会现场。

记者滕嘉 摄

## 马伯庸简介

作家，编剧。代表作有非虚构历史散文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，长篇小说《古董局中局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风起陇西》《三国机密》《龙与地下铁》，中篇小说《末日焚书》《街亭杀人事》，散文《风雨<洛神赋>》《破案：孔雀东南飞》《宛城惊变》等。作品《寂静之城》2005年获国内科幻文学最高奖项“银河奖”，《风雨<洛神赋>》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散文奖，《破案：孔雀东南飞》等短篇获2012年朱自清散文奖。2022年，马伯庸获第四届“茅盾新人奖”。

## 3 寄语桂林医学学子 赓续大医精神

这次读者见面会上，马伯庸携新书《大医》，和桂林医学学子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医学的故事。

《大医》缘起于2017年，彼时马伯庸受邀参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院史馆。华山医院的前身是红十字会总医院，是中国红十字会建立的第一所医院，院史馆里陈列的史料很丰富，其中的故事也很精彩，却从来没有被关注过。马伯庸直觉这是一个好题材，从那次之后，他就开始针对这方面的历史进行资料收集和调研，为了写出符合那个年代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手段，马伯庸查找、收集、购买了大量出版于民国时期的医学书籍。

抽丝剥茧的研究给作品提供了详实的内容，也成就了当天读者见面会的妙语连珠。见面会上，马伯庸和桂林学子分享的就是他收集的资料中的“八卦”。这些“八卦”包括了美国百万富翁的儿子靠最早的呼吸机“铁肺”从中国辗转回美国过完自己一生的故事；延安医生徐根竹解决黄土高坡“吐黄水病”传染病的事件；徐悲鸿就医时的饮食记录；伪造捐献盘尼西林逮捕令事件等。

《大医》的题材对于马伯庸来说是陌生的，这部书横跨1904年到1950年的中国近代史，在那个年代，中国还有这么一批有大医情怀的医生，他们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，而这样的情怀其实在我过去三年的抗疫中也深有体会，马伯庸觉得更应该用作品记录和传承这种情怀。更坚定了马伯庸完成这部作品的，是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的一段话：

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妍媸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，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。见彼苦恼，若已有之，深心凄怆，勿避险巇、昼夜、寒暑、饥渴、疲劳，一心赴救，无作功夫形迹之心。如此可为苍生大医，反此则是含灵巨贼。”这些话几乎和医学生们入学时必须要宣誓的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一模一样。马伯庸意识到，大医精神古已有之，孙思邈时代就已经有了“为民为国”的意识，传承至今也是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精神。

在医学院校和学子们分享《大医》时，马伯庸也对学子们寄予希望，他引用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创始人沈敦和发布在《申报》上的《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启》几句话勉励学子：概念时艰，伤心同类，我不之援，而谁援耶？

他说，这段话不仅适用于战争年代，也是我们每一代医学学子应该传承的“苍生大医”精神。

记者苏文娟